

世界历史通览【图文珍藏本】

世界通史



李伟智 主编
辽海出版社

世界历史通览【图文珍藏本】

世界通史

(中)

李伟智 主编

辽海出版社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概况

16 世纪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各国相继展开。当这场人文主义的春潮席卷整个欧洲之时，一场更为深刻的运动也在德国进行，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

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基督教逐渐进入了欧洲人的意识，并被接受。在一段时间内，基督教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建立学校、抵抗外来侵略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到 16 世纪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封建制度开始逐渐解体，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这时的基督教渐向保守。以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控制着欧洲的政治经济，宗教神学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

通过几个世纪的积累，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成为欧洲最大的封建主。他们通过宗教手段和世俗封建主的一切手段去剥削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罗马教廷极力维护旧的封建秩序，阻碍了社会进步。

当时的德意志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个没有统一行政机构的四分五裂的国家，没有全国性的法律、货币、度量，全国人口达到 1500 万，分别属于 7 个选帝侯、十几个大诸侯、200 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

在经济上，德国开始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经济，采矿业、纺织业等发展迅速。当时采矿工人已经达到十几万，从 1493 年到 1540 年，德国的白银产量达到了 85000 公斤，而当时欧洲其他各国的白银产量才两万公斤。另外，由于从地中海到北欧的商业道路需要经过德国，因此德国在欧洲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政治上的分裂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却给天主教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德国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相互勾结，成为德国最大的封建势力。天主教会占有整个德国 1/3 以上的耕地，有的天主教成了诸侯或者选帝侯。教会凭借其政治和宗教权力去掠夺和奴役人民，例如教会可以向人民征收各项名目的税收，包括大什一税（谷物）、小什一税（蔬菜）、血什一税（牲口）等。

天主教会的堕落，引起德国人民的极度不满。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强烈要求整个德意志民族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同时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一些诸侯和帝国骑士也希望减少天主教会占有的土地，取消他们的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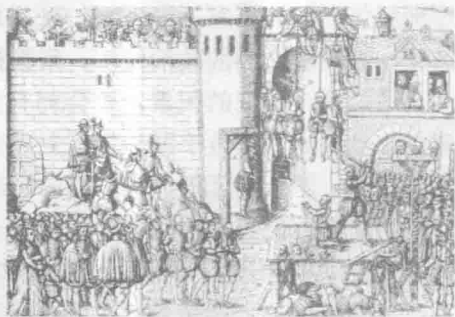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德国的宗教改革。

在德国宗教改革发生之前，天主教会内部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从14世纪开始，教会内部就开始对有关教义的争论，最终导致教会将教廷从罗马迁到了亚维农。在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之后，罗马和亚维农各选出了一个教皇，出现同时存在两个教皇的局面。另外，教会的腐化堕落也致使教会内部某些教徒希望能够对教会进行改革。

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提出要进行宗教改革，包括英国的威克里夫和捷克的胡斯，但是他们的微薄力量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影响。直到16世纪初，马丁·路德才真正开始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

1483年11月3日，马丁·路德出生在德意志东部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小矿主。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路德全家迁到曼斯菲尔德。在他5岁时，路德被送入曼斯菲尔德的一个拉丁语学校，13岁时被送到马格德堡读书。他的父亲希望马丁·路德长大后能够继承和扩大他的基业，因此在他中学毕业之后就将他送到爱尔福特大学学习法律。

在少年时代，马丁·路德就受到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同时目睹了天主教会的腐败糜烂，便下定决心要学习神学。因此，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爱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在那里学习神学。1510年，路德去了罗马。在那里，他看到教皇和其他教职人员的奢侈和败坏生活，使他非常震惊。他原先决定真诚苦行的决心受到了摇动。



胡格诺派教徒被处死的场面

1512年，路德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研究，路德形成了自己的神学思想。他认为，宗教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不能受到教会的强制和干预；一个人灵魂的获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什么教会的繁琐仪式，教徒灵魂的得救，并不一定要通过由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来达到；在强调《圣经》权威性的同时，他认为教皇颁布的敕令都是荒唐的；应该建立没有教阶制度、没有复杂的宗教礼节的“勤俭教会”。

1517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为修缮圣彼得大教堂，派人到德国贩卖赎罪券。荒唐的是，赎罪券价格的高低由罪行的大小而定，并且声称只要购买了赎罪券，罪人的“灵魂马上会从炼狱升上天堂”。

路德对罗马教廷的做法极其不满。10月31日，马丁·路德把一张拉丁文的告示钉在教堂的大门上，邀请参加“关于赎罪券功能的辩论，出于爱心和对真理的热诚，愿公之于亮光中”，即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的

主要内容就是讨论赎罪券的问题，揭露赎罪券的欺骗性，但是没有直接反对罗马教皇，只是说教皇并不知道此事。

在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到教堂大门上的同时，马丁·路德还将它们送给朋友和当地教职人员。辩论会并没有举行，但是其中一份公告到了迈恩的大主教亚伯特手里，他是包销赎罪券的人之一。他跟几个神学家商量，决定把公告送去罗马，并要求对马丁·路德采取压制行动，同时告诫赎罪券贩子，在贩卖时不要过分夸张。

但是路德这个《论纲》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其程度甚至出乎路德自己的预料。人们纷纷把这个《论纲》翻译成德文，互相传抄和讨论。到1518年初，公告已经被翻印、传送到好些城市。这时，全国掀起了要求宗教改革的运动，主题主要是宗教与钱财的关系。在不到一个月之内，欧洲各大学和宗教中心，都掀起一片热潮。

路德一下子成为德国全民族的代言人，在各阶层的热烈支持下，路德走上了同罗马教廷彻底决裂的道路。不久，路德发表了更为激烈的文章和演讲，直接否定教皇的权力。

教皇知道路德的举动之后，命令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总主持处分那不守规矩的会士。结果，路德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经过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开会辩论，免除了路德区会监督的职务。

1519年，罗马教会的神学家约翰·艾克同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展开了大论战。在论战期间，路德的教会朋友、威登堡的教员们都站在路德一方。最后，约翰·艾克狼狈不堪地败下阵去。

1520年是路德的宗教思想传播最快的一年。当年，路德一共出版了德文书籍133册，文章50多篇，其中包括被称作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这一年被视为路德宗教改革的最高潮。

在这些著作中，路德坚持认为教会没有教皇也能存在，并申明自己同意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的观点。继而，他的攻击矛头从原先的教皇指向整个封建神权政治。

路德的举动已经令教皇不能再忍受。1520年10月，教皇下诏书，勒令路德在60天内悔过自新，否则将开除他的教籍。为了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威登堡的神学院学生和一些教职人员在城门广场上，把教廷的书籍点燃焚烧。同时，路德也把教皇谕令投在烈焰中，并且宣告：“因为你污损神的真理，愿神把你毁灭在这火里！”

面对路德及其拥护者的举动，教皇一再敦促德皇查理五世为路德定罪，并决定于1521年4月17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为路德定罪。面对教皇和德国皇帝的威胁，路德拒绝朋友们善意的劝阻，昂首挺胸地到达沃尔姆斯。很多德国民众从其他地方来到沃尔姆斯，支持路德。一些德国的武士和

许多民众，都站在路侧，表示支持他。路德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

在帝国会议上，路德据理力争，毫不让步。当皇帝的代表问他“是否认错收回这些所发表的意见”时，路德清晰响亮、著名的回答，震动了欧洲，也决定了历史：“除非圣经或理由清楚的说服我，我受所引用的圣经约束，我的良心受神的话捆绑。我不能，也不愿收回任何的意见，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当。我不能那样做。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

查理五世、教皇等一帮人无计可施，只好宣称路德是“恶名彰著的异端分子”、“恶魔化身”，“他和他的党徒都该除灭”。同时，教皇宣布路德著作是异端邪说，应当禁止并焚烧。同时，教皇宣布开除路德的教籍。

在当时的欧洲，一个没有教籍的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任何人都可以对之进行追杀。在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路德只好隐居到瓦特堡，从事圣经翻译。

1522年，德文《圣经》新约部分出版。海涅认为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是“创造了德语”。德文圣经的出版，使所有德国人都可以读到自己语言的《圣经》，因此有助于宗教改革的进行。他的翻译为德国民众提供了对抗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

没有路德的威登堡，陷于混乱当中。人们开始反对天主教会，从而失去了信仰中心。一些诸侯趁乱夺取了教会的财产和领土，并在他们的领地之内建立了新教会。底层广大人民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行动起来，在反对罗马教廷的同时，开始起来反对封建主的压迫。不久，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当民众要把宗教改革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时，路德退缩了，并且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路德写信给选侯腓德烈说：“现在不是你保护我，是我保护你的时候了。”1522年3月，路德回到威登堡，住在那里直到离世。

回到威登堡时，路德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指责当时的农民起义。之后，他又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以求平息叛乱。后来，路德竟然说：“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的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死、扼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恩格斯后来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1529年，路德编写了《教义问答》。次年，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路德发表了公开纲领《奥格斯堡信条》，成为路德教的基本纲领和信仰声明。

1546年2月，路德病逝于出生地艾斯勒本，享年63岁。路德至死还坚持他的教义。当他弥留之际，有位教徒问他：“你是否至死坚信你所传的呢？”路德睁开眼睛，以坚定清楚的声音回答说，“是的！”这是他在世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路德病逝后，德国的新教运动并没有消失。1555年，德国皇帝被迫和新教诸侯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各个诸侯有权选择新教或旧教，他们的继承人如果愿意，也可以改变信仰；但是其所属领地内的臣民，只能信仰当时统治者所信奉的宗教。此时，路德教正式得到了确认。在此之前，挪威、丹麦和瑞典分别于1536年、1537年和1541年成为最先公开接受路德教的国家。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不久，加尔文也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建立了加尔文教；英国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成立了英国国教。到16世纪后期，基督教分化成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大派。应该说，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突破了传统宗教思想的束缚，使欧洲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恩格斯认为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

宗教改革条件的成熟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虽然仍是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但社会经济已较前有了很大进步。工业方面，采矿、冶金、纺织、印刷、武器制造业等都很发达。德国白银产量为全欧其他地方总产量的两倍半。全国总人口约有1200万至1500万，其中矿工的人数达十万之多，并且是当时欧洲最熟练的矿工。在矿冶和纺织等部门中，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日益增多。印刷和建筑业中已有十至二十名雇工的企业。在法兰克福、乌尔姆、斯特拉斯堡、海尔布琅、门明根以及科伦和奥格斯堡，“分散”型的手工工场甚为普遍。商业方面，德国的中介贸易、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对外贸易相当繁荣。在德国西部以科伦、美因斯、特里尔等城市为主，曾组成莱茵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多系莱茵河两岸的城市，以呢绒制造和金属生产著称。这些城市同尼德兰、法国和意大利贸易关系活跃。在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以汉堡为主的汉萨同盟，虽从新航路开辟后，已经失去了它原来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是，直到16世纪时，汉萨同盟的诸城市仍然在北海、波罗的海以及从北欧至西欧之间的商业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德国南部和西南边界上则建立了一个士瓦本城市同盟，它包括多瑙河上游约90个城市，为首的工商业中心是奥格斯堡、纽伦堡、乌尔姆等城市，奥格斯堡主要经营意大利的丝织品、印度的香料以及东方的各种商品，是东西方商品集散的中心之一。

虽然德国存有不少繁荣的商业城市，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有一些极大的富豪，如南德奥格斯堡的大银行家佛该尔，他不仅是矿山业的投资者、大银行家，并且是德皇以及许多大诸侯的债权人。他不但操纵着中欧的经济，甚至也极大地影响着德国的政治局势。但是，德意志帝国经济上的致命弱点，则是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上的严重分散，大城市都处于边疆地区，主要经营对外贸易，相反的，对国内贸易则关心不大，整个德国没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也“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

商业的中心。”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支持下，当然也就无力进行在海外殖民掠夺方面的竞争。因此，德国的经济较前虽已有长足的进步，并有一些方面超过了英、法等国，但以总体来比较，比法国、英国等先进国家，还是相差甚远的。



威克里夫的门徒到各处传播他关于宗教改革的思想

德国经济上分散性的特点，决定了德国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德国同当时中央集权制的英国和法国相反，实际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大联合。宗教改革前，在德国除七大选侯外，还有十几个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帝国骑士，他们各自独立，成为国中之国。诸侯、骑士和城市市民经常混战，或同德皇对抗。国内又复关卡林立，仅从美因斯到科伦不足二百公里，就有关卡十三处之多。德国的货币繁杂，达千种以上。政治分裂和封建混战，严重地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6世纪初，德国的阶级矛盾也同样十分复杂和尖锐。在封建贵族内部，统治的阶层是帝国诸侯。他们在领地内有收税、司法和铸币等特权，并拥有常备军。他们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实行集权，同德皇、教会互相对抗，残酷压榨农民，反对任何社会改革。低级贵族（即骑士）随着枪炮的应用和步兵作用的增长，其作用和地位均日趋下降。骑士反对诸侯跋扈，嫉视教会富有，希望统一德国与王权强大，但是，骑士又是个必然要竭力维护封建农奴制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而只能孤军作战。

天主教会，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同时又是最大的地主阶级来说，内部也有严格的教阶制度，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高级教士是特权阶层，靠搜刮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是当时德意志帝国各阶层都很嫉恨的主要对象，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在城乡中的一般僧侣传教士，属于低级僧侣，并多为平民出身，收入微薄，与下层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交往广泛，由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又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往往可能参加人民的反抗斗争，并为反抗斗争提供理论人材。

城市内阶级结构的变化也很大。城市贵族把持政权，与诸侯的联系和一致性增强，常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市民阶级包括手工业主、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他们要求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主张结束封建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建立“节俭教会”。城市居民的下层是平民，包括贫困的手工业者，帮工、日工，他们积极参加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但当时还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是占全德人口80%的广大农民。15世纪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主不断增加地租和徭役。有些地区，尤其是在西南部，

封建主力图将自由农变成农奴，还强占残留的村社附属地。封建主任意蹂躏农民及其妻女，农民稍有反抗或不满，封建主就施以割耳、劓鼻、挖眼、截指断肢、车裂等酷刑。有一位农民只从河里抓了几只螃蟹，便被封建主斩首。此处，农民还要受商人的剥削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农民是当时德国最革命的阶级，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德国在各种复杂的矛盾中，教会封建主是各阶层共同痛恨的对象。德国的天主教会不仅据有宗教特权，并且按鄂图一世（913—973）所规定的“鄂图特权”，高级僧侣同时就是大封建领主和地方行政、司法长官，他们占有和管辖全德 1/3 的土地和人口。教会不仅征收贡赋，要求农奴执行各种封建义务，还利用宗教手段，如征收什一税、出卖圣职、出售圣物、出卖赎罪券……等欺骗讹诈的手法，恣意榨取人民的血汗。据统计，16 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钱财多达 30 万古尔登之巨，这个数目比德皇的年收入还要多好几倍。因此，德国在当时有“教皇的奶牛”之称。

因此，德国反封建剥削、反罗马教廷、反抗天主教会特权统治的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

早在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之前，农民反封建主的起义斗争就此伏彼起。1476 年，法兰克尼亚的数万农民在牧人汉斯·贝海姆领导下举行起义。自 1493 年起 30 年间，农民在“鞋会”的旗帜下，多次发动起义。1502 年，“鞋会”起义不仅主张废除农奴制，而且提出了没收教产分给人民和建立统一的君主国的要求。1503 年，在士瓦本出现“穷康拉德”组织，其成员包括逃散的一部分“鞋会”成员。1514 年“穷康拉德”也曾发动过武装起义。上述各次起义虽都遭到镇压，但社会基本矛盾却更加尖锐，更大的斗争风暴正在酝酿当中。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德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和尖锐，当然主要矛盾是广大农民和封建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因当时各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教会问题上。所以德国大规模的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便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爆发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1483—1546 年）的宗教改革，点燃了德国这个火药桶。路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在大学学习期间，接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1511 年，路德去罗马朝圣，亲眼看到罗马教廷的腐败和黑暗，决心进行宗教改革。

1517 年，教皇立奥十世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教堂，在德国大规模地发售赎罪券。教皇的特使特兹尔前来出售，他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币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马上可升天堂，这种无耻行径引起许多人的反对。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写成“九十五条论纲”，公布于维登堡教堂的正门，

揭露、斥责贩卖赎罪券的无耻行径。路德不准备和教皇决裂，只想同教皇进行神学辩论。但是，当时德国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论纲”被人由拉丁文译为德文，不胫而走，各地争相传抄，两周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德国。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大火，人民群众纷纷投入了这场运动。由于人民的支持，路德的态度逐渐趋向坚决。1519年，在莱比锡的神学论战中，他开始否认教皇的权力，指出没有教皇，教会也可以存在。他公开同情胡司的观点，谴责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520年初，他号召“运用百般武器”讨伐罗马罪恶之城的蛇蝎之群，“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1520年12月，他当众烧毁教皇斥责他的论点为邪说的敕令。次年1月，教皇下令开除路德的教籍，路德写成《反对反基督者的敕令》，斥教皇为反基督者，还写成著名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族贵族书》，建议组织独立的德国教会，没收教会地产。1521年1月，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议会，要路德到会辩护或公开表示悔改，路德在一些大诸侯的支持下，拒不让步，会后皇帝下令逮捕路德。但路德藏身于萨克森公爵的瓦德堡，并利用空闲将《圣经》译成德文，影响颇大。使德国社会各阶层可以利用《圣经》的语句作为宗教改革的武器。

路德的宗教哲学的核心是“唯信称义”。他认为，信徒只要虔诚信仰上帝都可以和上帝直接交通，不需教会的中介，人死后能否得救（升天堂）惟有靠个人的信仰，信仰唯一的根据是《圣经》，而不是《圣言》（教皇的诏令和中世纪宗教会议的决议等）。《圣言》认为：人的得救必须通过教会和“圣礼”（在教会指导下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和捐献）完全是骗人的。因此路德主张建立没有教皇和教阶制度、没有繁文缛礼的廉价教会。

随着宗教改革深入，德国社会各阶级逐渐分裂为三大政治集团，即：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反动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有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和城市贵族，他们要求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温和的改良派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有新兴资产阶级、中小贵族和部分大诸侯，他们主张改革天主教，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但反对进行彻底的革命；激进的革命派集团，主要由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他们要求彻底推翻现存封建制度。路德在革命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抛弃了运动的下层人民，托庇于诸侯的保护，成了温和改良派的代言人。

路德教的确立和传播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对起义农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反攻倒算。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有10万以上的农民惨遭杀戮。幸存的农民多沦为农奴，重新陷入封建主的奴役之中。中产阶级的革命半途而废，城市特权被诸侯剥夺，不得不向诸侯交纳巨额赔款。更严重的是，工商业的普遍衰落和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

从1525年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只有诸侯。一部分诸侯不仅乘机夺得大量教

产，加强了对农民的压榨，而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利用路德宗教改革的形式，在自己的领地内保持路德教派，建立新教教会，自己成为教会首脑。利用路德新教作为加强政权工具的诸侯被称为新教诸侯。在萨克森选侯和普鲁士的公爵领地内，早在1525年已信仰路德新教，黑森伯爵领地内是1526年信仰路德新教的，接着在不伦瑞克—吕纳堡也流行了路德教。

路德为了建立路德教也广为活动。1527至1529年，路德在萨克森选侯领地内，曾随同新选侯约翰到各地巡视并督促路德教派的牧师开展传教活动，并且不准旧教徒举行



信徒肩上扛着皮鞭在教堂或集市广场上，用皮鞭疯狂地抽打自己

礼拜。特别是1529年10月1日至3日，路德在玛尔堡城内同慈温利的公开辩论，影响很大。路德将福音的基本观念归纳为“14条”，这便是路德派新教教义主张的重要根据。路德后期宗教改革活动的特点是加强系统的教理建设和创建与整顿路德宗的教会。他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如《基督教信仰的纲要并说明》是1529年5月发表的。《士马尔卡登信条》（1536年12月）、《论教会会议与教会》（1539年3月）是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其中详细阐明了路德派的教理和主张。《桌上谈》和路德译注的全部《圣经》修订本，充分表述了路德对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观点。路德晚年仍然坚持了同罗马教皇的斗争，直至他逝世。

德皇以及天主教诸侯力图在德国全面恢复天主教会的完全统治，因而同新教诸侯展开长期斗争。1529年，德皇查理五世召开帝国议会，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关于反对异端的禁令。在旧教诸侯结成“士瓦本联盟”之后，新教诸侯以萨克森选侯约翰和黑森伯爵菲力普为首，于1530年12月在萨克森境内的士马尔卡登小城聚会抗议并组成对抗性的秘密同盟，即“士马尔卡登同盟”。路德派新教诸侯由于对斯拜尔会议提出抗议，因而被称为“抗议者”。此后，在德国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新、旧教诸侯以及诸侯同皇帝之间的封建混战。新教诸侯最初曾受挫，后来某些天主教诸侯在法国国王的武力支持下，同新教诸侯一道反对德皇，在1552年战败了德皇的军队。经过谈判，1555年9月25日德皇与诸侯签订并颁布“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了诸侯在其领地内有权决定本人及其臣民宗教信仰之权利的“教随国定”原则。新旧教同权平等、路德教的合法地位从此得到确认。至此，路德派新教最后确立了。德国出现两个诸侯集团，北部和东北部属于路德教诸侯集团，南部和西南部属于天主教诸侯集团，德国的封建分裂局面加甚，并长期继续下去。

诸侯提出抗议，故路德教又称抗议教。1531年，他们组成士马尔卡登同

盟，抗击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武装，直到1555年双方才缔结奥格斯堡和约，规定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路德教在德国和天主教有平等地位，标志路德教的确立。

路德的宗教改革虽然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民建立廉价教会的要求；路德教会首领的世俗化，也适合一些国家加强王权和使教会民族化的需要。一些北欧国家，自上而下地实行宗教改革，改奉了路德教。1536年，丹麦国王实行宗教改革，剥夺了天主教会的大量地产，大多转归国王所有，国王成为教会的首领。1527年至1544年，瑞典国王也改奉了路德教，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直接管辖新教会。挪威国王也在同一时期接受了路德教。

路德教的确立和传播，大大缩小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对罗马教廷是一个沉重打击。

马丁路德的转变与奥格斯堡告白

沃尔姆斯会议以后，革命进一步深入。首先，托马斯·闵采尔站在下层人民一边批判路德，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其次，1522至1523年爆发了骑士暴动。原来路德的宗教改革一开始就得到骑士的支持。胡登曾致书路德，希望为了祖国的自由和解放建立密切联系。胡登知道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上的坚决态度后，曾写信声援，并谴责迫害路德的高级教士。沃尔姆斯会议以后，路德却更深地投入诸侯的怀抱，骑士遂单独举行暴动。骑士暴动没有得到市民或农民的支持，以失败告终。

革命深入以后，路德一再讲道和撰文攻击闵采尔和革命群众。1521年底，维登堡发生学生、市民冲进教堂驱逐神甫事件。一直躲在瓦特堡的路德再也坐不住了，潜回维登堡观察形势。1522年元月，他出版《劝基督徒毋从事叛乱书》，伪装公允，谴责双方，要群众“镇定”，听从“教导”，千万不能乱说，乱想、乱动，并提出上帝禁止暴动的口号。他还不指名地攻击闵采尔“草率从事”、“违反福音”。同年3月，路德在维登堡接连八次讲道，攻击群众“太过火了”、太“激烈”了，号召大家“彼此顺服，携手相助”。他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虽反对赎罪券和教皇，但从来不用暴力。1523年3月，路德发表《论俗世的权力》，公开维护当时的政治制度，号召“缴纳税款，尊敬长官”，“服事政府，帮助政府”。这篇奇文是路德堕落的耻辱柱。

1524年夏，德国南方首先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翌年达到高潮。在滚滚的农民战争洪流面前，路德把一切旧仇忘得干干净净，罗马教廷变成无辜的羔羊。他公然号召市民、贵族、诸侯和教皇团结起来反对起义的农民，堕落为可耻的叛徒。1524年8月闵采尔住在缪尔豪森，路德给市当局写信告密，请求镇压。1525年5月15日，当他获悉闵采尔被俘后立刻致书约翰·吕埃尔说：“我希望知道怎样捉住他、他是怎样表演的，这样可以彻底弄清这个家伙的傲慢无礼。这个可怜的畜生落到这个下场可怜又可鄙，然而，我们

有什么办法！这是上帝的意旨，要使老百姓懂得惧怕。否则，魔鬼会更加肆虐。这种不幸比较可取，这是上帝的审判，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同年5月，路德还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号召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应该把起义农民戮碎、扼死、刺杀、就像打死疯狗一样。路德仇恨革命达到疯狂的程度。

路德叛变以后，他从事的宗教改革蜕变成诸侯手里的工具。他虽然没有抛弃只靠信仰得救的主张，但对信仰的解释有重大变化。路德不再讲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了，却起劲地攻击自由意志。他一再攻击伊拉斯莫有关自由意志的观点，认为自由意志只能对挤牛奶、盖房子等小事情起作用，以信仰完全无能为力，甚至狂叫“理性是信仰之敌”。1529年10月16日，路德在提交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的声明（后称“路德告白”）中说得更清楚：信仰“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力所能及的，它是神的化工”。此外，他还极力污蔑农民、美化诸侯，甚至力争与天主教会重归于好。1529年，他在一次讲道中说：诸侯虽有宏伟的城堡，穿戴宝石、金项链和丝绒，但非常“忙碌、危险和劳苦”，庄稼汉闭眼不看诸侯之苦，只看到戴貂皮帽子是不对的；其实，“国王和贵族虚有闪光的外表，而臣民才有真正的黄金”，因为诸侯的貂皮帽下思虑和忧愁之多宛如帽上之毛。1530年6月15日，路德把他亲自审定的《奥格斯堡告白》提交议会宣读，系统阐述路德教的理论。告白以给查理五世的信为序，号召基督教各派“宽容、温和与平心静气地”协商，生活在一个教会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基督的臣民和战士”。告白还攻击自由意志和再洗礼派。恩格斯愤怒地斥责《奥格斯堡告白》是一场令人作呕的交易，是改头换面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路德的宗教改革蜕变为“庸俗市民阶级性质”的“官方的宗教改革”。马克思指出：“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路德教简化宗教仪式，废除圣象、圣物和十字架，牧师可以结婚，用地方语言做礼拜，实行廉价的教会。路德教会的首脑是诸侯，不受教皇控制。由于诸侯互不统属，德国没有统一的路德教会。德国北部和东北部的诸侯，如萨克森、麦克伦堡、普鲁士、不伦瑞克等改宗路德教，乘机夺取天主教会财产。南部和西南部的诸侯多宗天主教。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的原则，即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十六世纪时，瑞典、丹麦和挪威也改宗路德教，建立从属于王权的路德派教会，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今天，路德教是新教中最大的一派，在德国、美国和北欧诸国势力很大，拥有信徒约7千万人。

尼德兰革命

概况

“尼德兰”一词的原意为低地，是指欧洲西北部莱茵河下游、缪司河、些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低洼地，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的一部分。在中世纪初期，这里曾是法兰克王国的中心。

11 世纪后，这地区分裂为许多封建领地，分别隶属于德国和法国。15 世纪，它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勃艮第公国的部分。后来由于无免联姻及继承关系的演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16 世纪初又成为西班牙王国的属地。

早在 13 世纪至 15 世纪，尼德兰的手工业和商业就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弗兰德尔的呢绒业早已闻名整个欧洲。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国际市场的扩大，欧洲商业中心开始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由于尼德兰地处大西洋西岸，天然良港加上原先较为发达的工商业，使得尼德兰和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

16 世纪初时，尼德兰共有 17 个省，约 300 多个城市，总人口大约 300 多万，因此有“多城市国家”之称。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尼德兰各地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并不一样。在北部 7 省中，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这里是毛、麻纺织业和造船业中心。航海业和渔业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16 世纪中叶时，每年有 1000 多条船从阿姆斯特丹和北方诸省出海捕鱼，各类鱼年产值为 330 万杜卡特。

阿姆斯特丹是北方诸省的经济中心，当时这里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由于该城市的法律保障商业自由，并保护外国商人的利益，所以它与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及俄罗斯等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但与西班牙则较少经济联系。

在南方的弗兰德尔和不拉奔，纺织业、冶金业、印刷业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手工工场随处可见。不拉奔省的



6 世纪荷兰布市场

最大城市安特卫普是当时欧洲商业和殖民地贸易的中心之一，也是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业非常发达。由于该城拥有天然的良港，致使这里每天都有几千条商船进进出出。在城内的国际性商品交易大楼中，每天还有几千名外国商人在进行商业洽谈。据说，当时这个大楼门前悬挂着“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的标牌。此外，这里还有 1000 多个外国的商务办事处分支机构。

不过南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北方不同。北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依赖西班牙宗主国。而南方纺织业等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都依赖于西班牙市场，因此这里的资产阶级和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依赖关系。

另外，当时尼德兰东部以及北部的一些边远省份如阿多瓦、那慕尔、卢森堡等，经济发展还比较迟缓，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农奴制还在这里部分生存，农民对地主不仅有土地依附关系，甚至还有人身依附关系。

16 世纪初期之后，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法国，加紧对尼德兰的控制。尼德兰曾是历代国王“王冠上的明珠”，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在查理一世期间，西班牙在尼德兰获得的税收收入，是当时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因此，西班牙不希望看到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害怕新兴的资产阶级会脱离他们的控制。另外，西班牙还在尼德兰推行天主教统治，设立宗教裁判所，据此迫害给西班牙带来利益威胁的新教徒。当时有个恐怖的“血腥敕令”，规定凡是从事新教活动或者被指控为新教教徒的人，男的杀头，女的活埋。

但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势不可挡。在北方，大商人和大的工场、农场主已经成为城市的资产阶级，他们要求摆脱西班牙的压制以自由发展资产阶级。在宗教上，他们接受了加尔文教，给以天主教为统治阶级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以重大打击。由于有推翻西班牙封建统治的需求，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愿意和工人农民一起，共同打击西班牙殖民统治，并在运动中担任了领导职务。

南方虽然也发展了资本主义，不过由于这里的资产阶级和西班牙当局的关系太紧密，致使他们对西班牙殖民者妥协，不希望通过革命手段获取自身的发展。

那些靠封建制度生活的地主和旧贵族，更加不愿意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特权，继续维持天主教统治，所以他们是反革命者。一些和西班牙有矛盾的旧贵族，也只是希望能够仿效德国路德教诸侯和法国胡格诺贵族，通过宗教改革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手工工场的工人、农场的雇佣劳动者、矿工、帮工和学徒，以及城市贫民和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众，深受异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处境极端困苦。他们每天要工作 12 甚至 14 小时，却只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女工和童工的工资

更低。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了再洗礼派，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1556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上台，任命自己的姐姐玛格丽特公爵为尼德兰总督，由红衣主教格兰维尔辅政，全面加强对尼德兰的压迫和控制。玛格丽特到任后，迅速剥夺尼德兰17省的自治权利，到各地加派驻军。此外，尼德兰的天主教主教区从原先的6个增加到了20个，他们利用设立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接二连三地处死许多加尔文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

为了从经济上打击尼德兰资产阶级，腓力二世于1557年宣布国家“破产”，拒绝偿付原先向尼德兰银行发行的国债，致使尼德兰的银行家损失惨重。此外，他还宣布取消了尼德兰商人和西班牙殖民地直接通商的特权，禁止尼德兰和英国的贸易往来。1560年，西班牙故意提高西班牙羊毛对尼德兰出口的税率，使得尼德兰很多纺织业工场不得不关闭，大批工人失业，城市中的流浪汉日益增多。这些措施实施后，尼德兰北部城市原先的一派经济繁荣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萧条。

西班牙的暴行，激起了尼德兰人民的反抗，各地人民要求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尼德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激化，在佛兰德尔、不拉奔、荷兰、弗里斯兰和安特卫普等省市，先后多次发生新教徒反抗西班牙反动统治的暴动。

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首的尼德兰贵族，利用人民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组成了以中小贵族为主的“贵族同盟”。1566年4月5日，贵族同盟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敕令”，停止宗教迫害，召开三级会议，撤退西班牙驻军，免除红衣主教格兰维尔的职务等项要求。西班牙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一再辱骂他们是“乞丐”。

1566年8月，佛兰德尔等地方出现了以破坏圣像为主要形式的人民起义，起义者手执棍棒和其他武器，冲进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圣徒遗骨和遗物，并没收教会财物，焚毁地契和债券。运动迅速扩展，到10月份的时候，已经席卷了不拉奔、西兰、荷兰、弗里斯兰等12个省区，参加起义的人超过数万人，捣毁教堂和寺院5500多所。起义发展到后来，起义者不仅限于破坏圣像和烧毁债券、契约，还强迫市政当局停止迫害新教徒，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限制天主教僧侣的活动。

面对尼德兰的起义，西班牙首先采取了缓兵之计，暂停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允许加尔文教徒到指定地点做礼拜，赦免贵族同盟的成员。对此，害怕人民起义再次扩大的尼德兰贵族们和加尔文派的资产阶级领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班牙统治者做出的“让步”，反过来要求人民遵守秩序，一部分贵族甚至公开帮助政府镇压人民起义。

1567年8月，腓力二世派遣阿尔发公爵率领18000名士兵到尼德兰镇压起义。这个以残暴闻名的阿尔发一来到尼德兰就向外发布消息：“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他在尼德兰设立了

“除暴委员会”，用以审判起义者和异端分子。此后，绞刑架和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遍布各地，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大肆搜捕起义者，只要是参加过起义的人，一经抓到就马上处以火刑，甚至对一些没有参加起义的人，也以不起来反对起义的罪名加以杀害。因此这个“除暴委员会”又有“血腥委员会”之称。

在这场镇压中，大约有 8000 余人被杀，其中包括贵族反对派的首领厄格蒙特伯爵、荷恩大将以以及资产阶级领袖安特卫普市市长凡·斯特拉连等人；几万人的财产被没收。经过镇压之后，原先发达的尼德兰工商业处于停滞时期，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

当贵族和资产阶级纷纷逃亡国外时，广大的底层人民群众和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继续战斗，他们在密林中组成森林游击队，称为“森林乞丐”，袭击西班牙的小股军队。北方的荷兰、西兰、弗里斯兰等地的水手、渔民和码头工人组成海上游击队，称为“海上乞丐”，袭击西班牙船队和沿海据点。

各地游击队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1572 年 4 月，“海上乞丐”游击队收复了布里尔城，6 月又击溃了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削弱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到该年夏初，荷兰、西兰两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随之，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队伍日益壮大，一些逃亡国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也回来参加游击队，并且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

8 月，奥兰治亲王威廉在北方各省议会上被推选为总督。到 1573 年，北方 7 省先后都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虽然西班牙派来了增援的部队，但是都遭到起义军和尼德兰人民的顽强抵抗。不得已，腓力二世换掉了阿尔发，改派另一员大将去镇压起义，但是也是徒劳无功。

北方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南方各省人民的反抗运动，他们也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到处窜扰的西班牙军队。1576 年 9 月 4 日，布鲁塞尔爆发起义，起义者占领议会大厦，逮捕议会成员，并解散了国务会议，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最高统治机关。10 月，尼德兰南北各省的代表，在根特举行全尼德兰三级会议，商讨南北联合斗争问题。11 月 3 日，会议各方签订了“根特协定”，宣布废除阿尔发颁布的一切法令，各城市恢复原有的自治权利和贸易自由，南北联合共同反对西班牙，承认加尔文教的合法地位。

这次会议虽然提出了南北联合抗争的问题，但是对尼德兰独立和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却未涉及，于是人民群众决心把革命斗争继续开展下去。1577 年秋，南方的布鲁塞尔、根特和安特卫普军城市的人民又发动新的起义，在推翻了旧的市政委员会后，建立了革命的“十八人委员会”权力机关，并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某些省的农村也爆发了大规模打击地主的起义。

南方革命的高涨，引起了南方贵族、天主教的恐惧，1579 年 1 月 6 日，南方反动贵族长阿图瓦省城阿拉斯坦成“阿拉斯联盟”，承认西班牙对尼德兰的“合法统治”，并宣布天主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从此，南北方分道扬镳。